清代政治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的方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清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政治史的研究面临巨大挑战，出现了和其他领域相互对话、渗透和融合的新趋势，由此涌现出许多新的课题。值此之际，在对传统政治史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不断回应新兴研究领域中提出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有鉴于此，本刊为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于本期以“清代政治史研究笔谈”的形式，推出一组前沿文章，以飨读者。

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

刘小萌

在清史研究中，政治史研究一直是重点领域之一，它涉及范围广，包括制度、政策、边疆、民族、事件、人物、外交等诸多方面。近年来，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推动下，政治史研究的步伐明显加快，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出现了一批新成果。与此同时，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多学科研究交叉渗透、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中青年学者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下，传统政治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乃至学术观点等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化挑战为机遇，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对研究状况作一总结与前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话题。

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八旗不仅是清朝军队的核心部分，也是满族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基于此种关系，八旗研究在清朝政治史中据有重要地位，是很自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专注于八旗史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多，却是相当国际化的群体，除中国大陆与台湾，国际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日本和美国学者。在这篇短文中，笔者试就八旗研究的现状、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回应美国新清史等问题，提出几点浅见。

一、研究现状

中国的八旗史研究起步较早。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八旗制度考实》一文，钩稽清官书中旁见侧出者，以穷究八旗制度之本源，多灼见明识，至今仍为奠基之作。五六十年代由民委系统、民族院校进行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涵盖了旗人各主要聚居地的历史与现状，表明这一专题开始纳入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范畴。五十年代中，傅乐焕在《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中，曾就八旗土地、八旗兵饷、八旗生计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八旗史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满族史、清史著述踵相问世，尤其王锺翰师的“四考”——《清史杂考》、《清史余考》、《清史续考》、《清史补考》，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锺翰

［收稿日期］2010-01-30
［作者简介］刘小萌（195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师作为国内研究满族史、八旗史的领军人物，其治学特点在中国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一是长期从满族史角度研究清史，一是高度重视基本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是注重实证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八旗史、满族史研究中，同样贯彻始终。在实证性研究中，锺翰师尤重满文文献的利用，认为这是原创性研究的基础，并构成其研究的基本特色。他注重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切入八旗史和满族史研究，对八旗内部满汉等民族成分的融合、汉人"满化"与满人"汉化"诸现象，都有精辟论述。

近三十年来，在新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的一代中国学者，继承前辈治学传统和特色，薪火相传，在八旗史研究中开拓进取，取得了显著成就。成就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领域的扩大。在八旗形成、八旗制度、八旗组织、八旗社会、旗人群体（满洲、蒙古、汉军）、旗民关系（很大程度就是满汉关系）、旗人妇女、旗人科举等专题，陆续有专著行世，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杨珍《清朝皇位继承研究》，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祁美琴《清代内务府》，邸永君《八旗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以及笔者《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这些著作的水平虽有参差，但各有专攻，相得益彰，大体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八旗史的现状。

第二，研究方法多元。这批研究者基础扎实，多数具备较好的语言条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思想比较活跃。他们继承前辈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同时借鉴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妇女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一些人兼通少数民族文字，在利用满文、锡伯文、蒙古文文献研究八旗专题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三，新史料挖掘。国内学者在利用满汉档案研究八旗史过程中，重视新史料的开发，一是对房地契书、碑刻拓片、族谱家乘、舆图绘画、文学曲词、报刊杂志的利用，一是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丰富的口碑史料。在这两方面，国内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走在国际研究的前沿。

在国际学术界，研究八旗史取得突出成就的首推日本。日本研究八旗史起步最早，学术积蕴深，实力强，成果显著。从二十世纪初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以迄于今，百年期间代代有传人，涌现出稻叶岩吉（稻叶君山）、鸳渊一、户田茂喜、和田清、三田村泰助、旗田巍、中山八郎、圆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阿南惟敬、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石桥秀雄、细谷良夫、加藤直人、中见立夫、松浦茂、江夏由树、石桥重雄、柳泽明、楠木贤道等一大批著名学者。

日本的八旗史研究，长期以清初史为龙头，在相关的满族史、蒙古史、北方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均有力作行世。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重视满文档案的翻译利用。自1905年内藤湖南在盛京（沈阳）清宫发现满文老档以来，日本学界始终把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作为研究八旗史和清初史的基础。东洋文库作为日本东方学研究中心，长期聚集着清史和八旗史领域最优秀的一批学者。文库相继出版了系列的学术专著、论丛、丛刊、文献目录和索引，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八旗史有关。《满文老档》7册、《旧满洲档—天聪九年》2册、《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1册、《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2册、《镶红旗档—雍正朝》、《镶红旗档—乾隆朝》2册，是日本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整理翻译满文档案的代表性成果。对满文《内国史院档》的翻译工作，目前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它如《东洋文库所藏满蒙文献目录》、《东洋文库藏镶红旗档——引言和目录》、《八旗通志列传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对利用满蒙文档案研究八旗史，提供了很大便利。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事满文档案翻译者，除少数出身满语专业的历史学家（著名者如佟永功、关嘉禄），主要由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满文部专家构成。与此不同，日本的满文文献翻译工作，则始终由史学研究者自己承担。为此，他们组织了独具特色的满文档案读书会。参加者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聚集一处，逐段逐句研读翻译满文档案，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其好处：一是使参与者的满文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既收到集思广益、疑义相释的实效，又加深了对满文文献的理解，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通过研读和彼此切磋，实现了学术前辈对后辈的传、帮、带。日本几代学者，从耄耋高龄到二三十岁的新锐，之所以都能熟练掌握满文译写，与此种学习方式有直接关系。

日本学者研究八旗史、清初史、满族史，始终以满文档案为主，其它文字文献为辅，这是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基本特色。远者姑且不提，近年出版的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满学五十年》，松村润《明清史论考》，以及研究集体的三部论文集《清代中国的诸问题》、《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都是运用满、蒙文档案探考八旗专题的典范。

第二，八旗史与民族史研究紧密结合。日本的八旗史研究，始终与满蒙史结合，近年来，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除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对八旗制度统摄下的各民族群体：东北“新满洲”人、“库雅拉”人、达斡尔人，以及布特哈八旗、察哈尔八旗、新疆回子（维吾尔人）佐领、锡伯佐领等，都有专门研究。

第三，重视实地调查。实地考察包括田野调查和史料调查两个方面。田野调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中国学者参与下，对东北三省的清朝遗迹进行了新一轮的实地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考察成果，收入细谷良夫主编《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进入本世纪以来，细谷良夫又与笔者合作，对清代八旗各驻防地的历史遗迹、旗人群体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实地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基本结束，若干报告已在日本发表，全部调查成果计划在中国结集出版。

史料调查，也是日本学者颇具特色的一项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细谷良夫主持下完成了大型课题《清朝国家形成时期诸史料的综合研究》，目的是从整体掌握中国大陆和台湾所藏清史档案状况，并把档案作为进一步开展清朝史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把调查满汉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美国、俄罗斯、蒙古等地。

第四，注重实证性研究。日本史学与中国史学都具有注重实证性研究传统，日本学者普遍学风严谨，心无旁骛。近些年来，他们虽然也受到美国新清史等西方史学的影响，但始终恪守自己的研究传统。诚如学界所公认的，其研究素以考证见长，虽少有耀眼的思想火花，也没有轰动一时的效果，却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中、日学者的八旗史、满族史研究源远流长，在传统和方法上有差异也有重合，成就则各有千秋。与中日研究相比，宏观的理论思考显然是西方学者的特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学术界对八旗史研究的升温，出版了罗友枝《清代皇廷社会史》，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孤军》、《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满与汉：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Mark C. Elliott）《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从理论方法到具体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清史界很快引起关注[①]。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于 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 1965 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与罗进行辩论。这两篇文章，已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

料。笔者认为，这种概括似有不妥。如前所述，这两个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上述两个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澄清上述事实，并不是要否定新清史的倡导之功。在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利用满文文献研究八旗史方面，中日学者固然起步甚早，成果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往国内一些学者论到清史，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族，通常只占很小比重。不少学者，对满族在清朝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满族制度（八旗制度、内务府等）与文化在清朝史中的深刻影响，缺乏应有关注；对满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视，则长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者范围。然而，当新清史提出上述观点时，情况不同了，国内一些学者，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推其波而助其澜，以“汉族中心论”为代表的一些陈旧观念，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清史在端正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为什么新清史会产生如此大影响？挟美国强势文化之余威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新清史的话语系统中，强调满族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提法，而是从其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中导引出的一种方法论要求。这一逻辑关系或可概括为：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带有不同于汉族王朝的鲜明特点；满族不仅是中原汉族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东北亚诸多民族的共主。从这个角度讲，重视满族与满文文献，乃是上述逻辑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话说回来，美国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笔者以为，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等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上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②]。不过，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满族）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还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它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在《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 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一书中，有关满洲的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新清史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其新颖大胆而风靡一时。关于满族形成，传统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极改“诸申”为“满洲”，是满族形成的标志。对这种观点，新清史提出要重新审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满族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在这之前只是文化共同体，到乾隆年间始形成血缘共同体；还有学者认为，满族到清末民初才形成，正是在汉人反满思潮的强大压力和刺激下，满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关于满族是否“汉化”，以往学者，往往将满族“汉化”简单理解为汉族一方的主动灌输与满族一方的被动接受。新清史则指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相

反，有清一代，满族尽管与汉族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并没被汉化；没被汉化的原因，是因为八旗制度的保障；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是清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新清史与八旗史、满族史研究关系密切，因此从它崭露头角时起，就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一旦陈陈相因的“成见”或“定论”被新清史打上问号，也就意味着新研究的起步。从这个角度讲，新清史的异军突起，的确给清史研究的发展带来某种契机。

二、如何回应新清史

十几年来，新清史的影响逐渐扩大，但迄今为止，除了若干译著和介绍文章，中国学者尚很少提出严肃的学术性批评。如何对新清史作出回应，并通过对话实现与新清史的互动，共同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已经提上中国清史研究界的日程。

笔者认为，回应新清史，首先要端正我们的态度。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围绕新清史的一系列新观点，中国学者完全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不过，我们首先应致力的，不仅是求其“异”，而且要求其“同”，从新清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角度、理论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中汲取有益启示，以矫正思维和观点的偏差，毕竟我们久已习惯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学术环境下工作，而传统的惯性往往会消磨思维的敏锐。

回应新清史，应就基本概念予以澄清。概念是历史研究的支点，概念涵义不清，就无法阐明历史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探讨满族是否“汉化”，首先应对“汉化”的涵义、“汉化”与汉文化“涵化”的差别作出说明[③]。否则，概念模糊，言人人殊，各执一端，讨论难以深入。再如考察八旗问题，不能不涉及“旗人”、“旗族”、“满人”、“满洲”、“满族”诸名称。清初已有“旗人”、“满洲”、“满人”之谓，清末出现“旗族”一称，辛亥革命后提倡“五族共和”，始有“满族”的流行。“满人”、“汉人”、“蒙人”等称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族类概念，而作为民族专属名称之一的“满族”，则是自西方辗转传入的现代概念。这些概念，在涵义上有衔接又有差异，有重合又不能简单等同。目前流行把满族概念等同于清代的“旗人”、“满人”或“旗族”，表述固然便利，但在许多场合，却可能造成“今人”对“古人”的一种理解错位。

回应新清史，应承认研究取向上的差异。关于满汉关系，新清史侧重从满汉对立的角度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满汉融合的角度来思考。关于清朝特色，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则兼顾“清承明制”与“满族特色”两个方面。关于八旗社会，新清史强调八旗制度的特殊性和封闭性，中国学者则关注八旗制度阻隔下旗民关系（满汉关系）的实际发展。关于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在此无须展开。重要的是，承认差异，明确差异，进而通过讨论，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弥合差异的基础上求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共识。

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通过讨论恐怕也难以陶融。中美学者，各有自己的国情，存在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研究角度、理论方法的诸多差异。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如有学者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声称满族先是文化共同体，后来成为血缘共同体，与满族的历史实际显然枘凿不合。再如把自我认同，作为近代满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其实，与民族、族群相关的诸多概念，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围绕这些概念已争论了至少几十年，聚讼纷纭，迄今仍未有穷期。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都离不开从国外学术界的批量引进，与之相比，中国史研究则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它们只有适应中国的实

际情况，才会有落地生根的可能。

回应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新清史在“矫枉过正”的同时，有时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否定满族所建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和汉文化的主导作用。这些观点或倾向，有失偏颇，不仅中国学者难以认同（当然有少数例外），实际上在美国学者中，也有分歧和争议。

新清史的兴起，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也给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要在国际化大潮中继往开来，作出更大成绩，笔者以为，以下三点应该重视：

一是要有全局意识。中国大陆、台湾与日、美、韩、法、俄等国学者，在研究清史方面各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但多年以来，国内学界似乎过于偏重对新清史的关注，对他国学者的研究和贡献却往往疏于了解。信息来源畸重畸轻，明显失衡，不能不制约中国清史学界的国际视野，偏见的产生也在所难免。其实，日、俄等国对八旗史、满族史、满语文的研究均堪称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包括其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乃至严谨作风，颇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借鉴。清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实有待于中国学者全局意识的提升。

第二，要有主体意识。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和八旗史，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那种将西方理论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第三，要重视少数民族文献。在八旗史、满族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利用尤为重要。近十几年来，特别是自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以来，国内在满、汉文档案、档案目录的整理翻译出版，满汉文辞书编纂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绩，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刊布的满文档案数量庞大，能够利用它从事研究的学者却很少，后续人才严重匮乏。对照日、美诸国高度重视非汉文史料运用，并加紧对多语种人才培养的现状，中国清史界差距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成为扼制研究正常发展的一个瓶颈。

以上以清史中的八旗史研究为重点，就研究现状、国际交流、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想法或建议，未必妥当。敬祈中外同行不吝赐教。

---

①中国的介绍文章主要有，定宜庄：《美国与台湾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美］欧立德著，华立译：《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美］盖博坚著，王湘云译：《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马钊：《满学：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载《清史译丛》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静：《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价》，载《清史译丛》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典蓉：《清代满洲认同的几个问题》，载《清史译丛》第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盖博坚著，孙静译《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张瑞威：《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载《清史译丛》第7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文鹏：《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清史研究》2009年4期。

②参见［美］卫周安：《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③参见王成勉：《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版。